

陳伯達

論毛澤東思想



2 028 0078 1

陳伯達

論毛澤東思想

——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結合
(爲紀念中國共產黨的三十週年而作)

人民出版社

書號：1153
論毛澤東思想

著者：陳伯達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
印刷者：北京新華印刷廠
(阜成門外北護土路)

字數：39,000 一九五一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印數：620,001—650,000 一九五二年八月北京第二版
定價(精) 9.000元 一九五三年六月北京第十次印刷

目 錄

一	毛澤東同志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最傑出的代表	一
二	近代中國是東方許多矛盾的焦點	四
三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一〇
四	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革命	一五
五	從農村的革命根據地到全國的革命勝利	二二
六	又聯合又鬥爭的廣泛統一戰綫	三〇
七	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問題	四二
八	黨的建設問題	四七
九	結束語	五七

一 毛澤東同志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最傑出

毛澤東同志所著「論人民民主專政」寫道：

「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如大家所知道的：中國這種先進分子第一個傑出的代表者，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同志。

毛澤東同志對於中國革命的最偉大的功勞，便是他正確地和生動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解決了中國革命中一系列的問題。他在中國和東方的條件下推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科學的發展，因而指導了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

毛澤東同志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但是要正確地運用他們的理論到中國來，使之變成大眾的力量，而戰無不勝，



這就必須經常清除思想上的障礙物，進行思想上的戰鬥，而且是猛烈的戰鬥。三十年來毛澤東同志不斷地和黨外的各種反動思潮及黨內的各種機會主義，作了不調和的鬥爭，例如，反對國家主義派，反對國民黨右派及其調和派，反對陳獨秀主義，反對托洛茨基主義，反對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右翼對於國民黨反革命統治的各種改良主義幻想，反對黨內幾次的「左」傾冒險主義，反對再版的陳獨秀主義的錯誤，等等。毛澤東同志在這一連串的鬥爭中，表現出他是傳播和運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革命學說的偉大能手。他所進行的這一連串的鬥爭，壯大了和鞏固了中國共產黨。

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特點。毛澤東同志在革命的中國，追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這些大師，和他們同樣，極端注視革命羣衆的偉大創造力。毛澤東同志從來不把他所從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工作和羣衆的革命運動分離開來。他隨時隨地聯繫着中國革命的實踐，「用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階級分析的方法」（如毛澤東同志所常說的），去考察、吸引和集中中國革命各種實踐的經驗。這就進一步地證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顯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有無限的、生動的革命威力。

毛澤東同志正是依靠中國革命羣衆的創造力，依靠中國革命各方面複雜的經驗，正

是在這些基礎上，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並使得那種企圖破壞或歪曲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切胡說，不能不在羣衆面前一一宣告破產。

一九二二年列寧發表的名文「論戰鬥唯物論的意義」說過：「……馬克思把這個辯證法運用得極有成效，以致現在東方各國（日本、印度和中國）新興階級，即佔世界人口大多數但歷來都因消極冷淡與沉眠不醒而使歐洲許多先進國內發生停頓腐敗情形的數萬萬人民奮起鬥爭的事實，新民族與新階級奮起鬥爭的事實，日益鮮明地證實着馬克思主義。」毫無疑問：中國人民在中國工人階級領導下奮起鬥爭及其最近偉大勝利的事實，正是極鮮明地證實着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東方的大規模的突出的勝利，證實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學說對於全世界乃是毫無例外的普遍的萬能的科學，證實着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同志把這個科學應用到中國的條件來，並發展了它，其所達到的成功乃是非常光輝的。

二 近代中國是東方許多矛盾的焦點

近百年以來，特別是十九世紀末年以來，在東方，中國曾經是許多矛盾的焦點。

第一，中國曾經是各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世界上所有的帝國主義國家都插手到中國來，並把它當成一塊最大的肥肉去爭奪。

一九一六年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指出：『在世界已分割完結的財政資本時代，爭奪這些半獨立國的鬥爭，當然是特別的緊張。』『帝國主義之瓜分中國，還剛才開始。日美等國間為奪取中國的鬥爭，日益緊張起來。』

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曾經指出：『中國是在民族方面有幾萬萬人口的國家，是全世界上極重要的出售商品和輸出資本的市場。……帝國主義就必須從民族的中國之活的身體上開刀，把它分割成碎片，奪取它整個省份，以保持它們的舊有陣地，或者最低限度維持這些陣地的一部分。……』

由於各帝國主義都以中國為其宰割的對象，所以帝國主義曾經在許多場合形成過統一戰綫，用以反對中國的革命（例如：一九〇〇年帝國主義八國聯軍進攻北京，屠殺義和

國的愛國羣衆；一九二七年各帝國主義聯合反對中國大革命，或形成了共同宰割中國的局面。可是，又由於帝國主義間各有佔取最大利益的壟斷野心，所以就形成了它們彼此之間深刻的矛盾，形成了——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帝國主義在中國相互間的鬥爭』。

這就是說，各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矛盾，使它們在中國的陣綫時常是分裂的，而不是統一的。

第二，各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和鬥爭，影響到中國舊統治階級——封建買辦階級內部的矛盾及其鬥爭的複雜化和激化，並演化爲軍閥間的不斷的戰爭。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八年說：『帝國主義和國內買辦豪紳階級支持着的各派新舊軍閥，從民國元年以來，相互間進行着繼續不斷的戰爭，這是半殖民地中國的特徵之一。……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有兩種，即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①

這就是說，中國封建買辦階級分別替不同的帝國主義服務和代表不同的地方封建勢力，使它們的統治營壘的內部是分裂的，而不是統一的。

第三，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聯合壓迫，使中國人民遭受了極深重的災難。但是，

① 斯大林：『與中國勞動大學學生的談話』。

② 『中國的紅色政權爲什麼能夠存在？』

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主義的鬥爭，總是前仆後繼，此伏彼起，沒有中斷過。如說有什麼中斷的話，也只在一些很短的時間。又因為中國是人口衆多的大國，在每次鬥爭中所動員起來的人們，總是數量很鉅大的。

中國人民和每一個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者都打過仗。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向任何革命王朝屈服過。中國曾經是一個處在長期革命中的國家。

這就是說，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中國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鬥爭中逐步地形成了一個極其強大的聯合的力量。

由上述種種可知：近代中國表現出是東方矛盾的焦點，主要地說來，其一是各帝國主義相互間激烈爭奪的焦點，又其一是革命和反革命激烈鬥爭的焦點。

顯然，只有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才能夠解決這些矛盾，而使帝國主義在東方的鎖鍊首先在中國被突破。中國人民是有贏得這勝利的力量的。但是中國人民的力量，只有當其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才能夠組織成爲真正能夠贏得勝利的力量。

中國工人階級形成其特出的戰鬥性，有三個重要的原因：第一，它身受幾重殘酷的壓迫，即外國的帝國主義、本國的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壓迫；第二，它是很集中的。中國工業雖然很薄弱，但却很集中，近代產業工人在有五百個工人以上的企業內做工的，佔很大的數目；第三，中國近代產業工人雖然在全國人口中佔少數，但全國各種的無產者和半無產者，却是一個極鉅大的數目。連農村中的半無產者——貧農在內，那

末，無產者和半無產者的人口就大大地超過全國人口的半數，他們所受的各種壓迫都是極其悲慘的。這些原因，就使得處在革命中的中國工人階級形成了很強大的戰鬥力，形成了自己堅強的政黨——共產黨，並成爲中國各革命階級的領袖。

在這樣長期革命的大國中，有這樣堅強的革命工人階級成爲極其廣大而富有充分戰鬥性的農民的領袖，成爲一切革命力量的領袖；而在國際範圍內，這是正處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正處在社會主義已首先在俄國勝利的時代，中國革命有了很好的國際援助；這些就是說明：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封建買辦階級的勝利，乃是不可避免的。

一九二七年斯大林指出：

「在中國，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一定要採取深刻地人民的和鮮明地民族的性質，一定要一步加深一步，一直到同帝國主義作拚命的決鬥，震撼帝國主義在全世界上的基礎本身。」

事情的經歷就正是如此。

當然，不可能設想，革命在這個曾經成爲各帝國主義爭奪焦點和在年代上有很長久的封建制度的大國，是能够輕易取得勝利的。不，這是不可能輕易取得勝利的。毛澤東

同志在一九四九年八月間所寫的一篇論文裏曾經形容了這種取得勝利的過程：『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積一百零九年的經驗，積幾百次大小鬥爭的經驗，軍事的和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經驗，方才獲得今天這樣的基本上的成功。』●這就是說：中國革命的進行是極其殘酷、複雜而曲折的。這樣，就極大地鍛鍊了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人民，極大地鍛鍊了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而這種豐富的革命經驗，也就又變成了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人民非常寶貴的財富；這種豐富的革命經驗，也就不可避免地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

中國這種豐富的革命經驗，就是集中表現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上面，集中表現為毛澤東思想。

列寧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間曾經對東方共產主義者指出：

『在這裏，在你們面前擺着一個任務，這個任務從前在全世界共產黨員面前是沒有提出過的，這個任務就是：依靠一般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你們在應用於歐洲各國所沒有的獨特條件時，須要善於把這個理論和實踐應用於這樣的條件，即農民是主要羣衆，所要解決的鬥爭任務不是反對資本，而是反對中世紀的殘餘。』

『你們應當找出全世界先進無產者與往往生活在中世紀條件下的東方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底這種聯繫之獨特形式。』

列寧下面又繼續指出：

「任務就在於喚醒勞動羣衆求取獨立和組織的革命積極性，不論他們是處在那種水平上，就在於把較爲先進的國家底共產黨員所享用的真正共產主義學說譯成每種人民的語言，就在於實現那些應當立刻實現的實際任務、並且在總的鬥爭中與其他各國無產者打成一片。」

這就是你們在任何一冊共產主義書本中都找不到解決然而在俄國已經開始的總的鬥爭中可以找到解決的一些任務。你們必須提出任務，並用獨立的經驗加以解決。」

大家知道：列寧和斯大林，在他們一系列的著作中，業已在基本原則上，解決了列寧在這裏所提出的任務，而斯大林在中國問題上並作了特出的理論貢獻。

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同志的任務是繼續列寧斯大林的工作，不斷地考察中國的經驗，把一般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跟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融會貫通起來，把先進國家的共產黨員所用的真正共產主義學說譯成中國人民的語言，根據中國的條件補充了它，轉化爲中國革命的理論與實踐，激發起幾萬萬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國主義的總鬥爭匯合起來，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和各國的工人階級及先進的人們，和一切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結果就在中國偉大的土地上埋葬了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

● 「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 列寧：「在東方各民族共產主義組織第二次全俄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三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把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看成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這是列寧斯大林的理论。

根據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毛澤東同志從來不把中國革命當成孤立的問題去看待，而是從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全局去看待它，從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全局去看待它。

這是因為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是社會主義已在蘇聯首先勝利的時代，是馬克思主義的新時代即列寧主義的時代。這是因為中國的革命首先就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

一九二六年三月間，毛澤東同志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文章中，爲了批駁當時國民黨的戴季陶主義，分析了世界分裂爲兩大營壘的局面：

「……現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兩大勢力作最後鬥爭的局面。這兩大勢力豎起了兩面大旗：一面是紅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國際高舉着，號召全世界一切被壓迫階級集合於其旗幟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國際聯盟高舉着，號召全世界

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於其旗幟之下。那些中間階級，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沒有他們「獨立」的餘地。」

毛澤東同志這裏所說，很清楚的，是把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的世界局面，分別爲一個是在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這個總運動的領導之下的反帝國主義的營壘，而另一個則是爲一切反革命勢力所依附的帝國主義的營壘。當時代表資產階級右翼的國民黨戴季陶派，實際上是準備蔣介石反革命的喉舌，他們反對階級鬥爭的學說，反對國民黨聯俄和聯共，妄想「獨立」在兩大營壘的中間，實現所謂資產階級一階級統治的國家。毛澤東同志指出他們這種企圖是完全要破產的。中間階級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民族資產階級或者向左走，聯俄聯共，承認無產階級的領導，和世界的反帝國主義的總鬥爭相匯合；或者向右走，反蘇反共，反對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成爲帝國主義的走狗；除此而外，是沒有「獨立」的餘地的。大家知道，當時的事實就是這樣：民族資產階級的右翼不久就隨着蔣介石的反革命而跑到帝國主義方面去。

在抗日戰爭年代，由於我們黨的倡導，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綫重新建立起來。但國民黨頑固派又重新彈起什麼資產階級專政的濫調，在實際上乃是用以掩飾並堅持蔣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的專政，國民黨的「一黨專政」；這類專政也即是毛澤東同志所指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專政。另一方面，在我們黨內則重新出現了一種企圖使無產階級變成大資產階級尾巴的右傾機會主義。爲了粉碎國民黨頑固派的各種謬論和黨內

的右傾機會主義，使中國無產階級，使中國廣大的人民，使我們的黨，在這個新的民族統一戰綫的複雜局面中，不至迷失自己的方向，毛澤東同志於是寫了一本重要的戰鬥著作，即『新民主主義論』。

在這個戰鬥的新著作裏面，毛澤東同志更具體地和極深刻地發展了上述列寧斯大林關於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學說。毛澤東同志引述了斯大林的文章，並根據了中國革命長期再積累的經驗，重新提出並詳細論述了中國革命基本方向——也即中國革命基本路綫的問題。

毛澤東同志說明了：『……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他接着寫道：

『在世界資本主義戰綫已在地球的一角（這一角佔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崩潰，而在其餘的角上又已經充分顯露其腐朽性的時代，在這些尚存的資本主義部分非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過活的時代，在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建立並宣佈它願意爲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而鬥爭的時代，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一天一天從社會帝國主義的社會民主黨的影響下面解放出來並宣佈他們贊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時代，在這種時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果發生了反對帝國主義，即反對國際資產階級、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屬於新的範疇了；它就不再是舊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

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

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一個根本的估計，根本的分析。由這個分析，便能够很自然地對於中國革命的基本方向，引出一個極端明確的結論，這結論就是：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個結論同時也就說明了下列各點：

第一：「這種革命，是澈底打擊帝國主義的，因此它不為帝國主義所容許，而為帝國主義所反對。但是它却為社會主義所容許，而為社會主義的國家和社會主義的國際無產階級所援助。」「這個世界上，所有帝國主義都是我們的敵人，中國要獨立，決不能離開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這就是說，不能離開蘇聯的援助，不能離開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國無產階級在其本國進行反資本主義鬥爭的援助。」

第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漢們，要就是站在帝國主義戰綫方面，變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國主義戰綫方面，變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沒有的。」「社會主義的蘇聯和帝國主義之間的鬥爭一經進一步尖銳化，中國不站在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這是必然的趨勢。難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嗎？這是夢想。全地球都要捲進這兩個戰綫中去，在今後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騙人的名詞。」

第三：「現在的世界，是處在革命和戰爭的新時代，是資本主義決然死滅和社會主

義決然興盛的時代。在這種情形下，要在中國反帝反封建勝利之後，再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豈非是完全的夢囈？」『這是斷然的，一定的，確實的，中國資產階級頑固派如不覺悟，他們的事情是並不美妙的，他們將得到一個自尋死路的前途。』

第四：『……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磅礴於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國自有科學的共產主義以來，人們的眼界是提高，中國革命也改變了面目。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共產主義去指導是決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說革命的後一階段了。……現在的世界，依靠共產主義做救星；現在的中國，也正是這樣。』『誰要反共誰就要準備變成齏粉。』

上述種種論點，都是毛澤東同志在十年前這個『新民主主義論』的著作中所指出的。自此以後，毛澤東同志在許多著作中又繼續發揮了上述的論點。世界的和中國的十年以來的事變，都把毛澤東同志上述的論點一一證實了。

當然，這些論點的發揮也就粉碎了資產階級的狹隘的反動的民族主義，並清除了小資產階級的滿足於落後的孤立小天地的民族偏見。

運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學說，特別是運用列寧、斯大林的學說，從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一個基本觀點，來考察中國革命，分析中國革命，從而發展了這一個基本觀點，指導中國革命朝着正確的方向前進，這是毛澤東思想勝利的道路。

四 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革命

毛澤東同志根據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所引起的世界歷史的根本變化，以及中國近代無產階級登上政治舞台所引起的中國歷史的根本變化，指出了在這種變化之前的中國革命爲舊民主主義的革命，即在資產階級領導下的民主主義革命；在這種變化之後的中國革命爲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即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民主主義革命。

毛澤東同志從黨建立後的第一個革命時期內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起，不論在任何情況之下，一直堅持並根據中國的條件具體地發展了列寧斯大林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學說。在抗日戰爭初期，毛澤東同志和新出現的右傾機會主義作了不調和的鬥爭，經常特別強調要鑒戒一九二七年陳獨秀機會主義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所造成革命失敗的罪惡結果。毛澤東同志經常告訴中國共產黨員要熟讀列寧的『兩個策略』這個偉大思想的著作。毛澤東同志把列寧這個著作，作爲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強有力的武器。

關於中國革命的無產階級領導權這個問題，是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相聯繫的。一九二六年斯大林『論中國革命的前途』的文章說到民族大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的時

候，就這樣說過：『……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中國革命倡導者和領導者的作用，中國農民領袖的作用，必不可免地要落在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手中。』

毛澤東同志說：『在中國，事情非常明白，誰能領導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誰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為人民的死敵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而特別是帝國主義的緣故。……歷史已經證明：中國資產階級是不能盡此責任的，這個責任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了。』●

毛澤東同志指出：『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爲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第一步，雖然按其社會性質，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然而這種革命，已經不是舊的、被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爲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和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爲目的的革命。』●

毛澤東同志把這個革命，規定爲下列簡單明確的公式：『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革命。』有的地方，毛澤東同

志又叫做『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勢力的人民民主革命』。由於以蔣介石爲首的四大民族在長期反革命的過程中，最後形成了官僚資本的壟斷集團，於是這種革命性質也就加進了反官僚資本這一個新的東西。毛澤東同志把反官僚資本這個新東西加進到這個公式裏面去，就成爲這樣的公式：『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和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毛澤東同志認爲這就是中國革命第一階段的總路綫和總政策。

在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這個公式裏面所說的人民大眾，主要的就是指農民。這個革命是以工農聯盟爲基礎、但包括一切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人們的革命。在毛澤東同志看來，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與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力量，而無產階級乃是領導的力量。

由這個革命所建立起來的革命的民主專政，當然也是這樣的階級基礎。這個革命的民主專政，毛澤東同志叫做『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又叫做『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

無產階級領導的問題，在毛澤東同志看來，這是解決中國革命一系列問題的中心問題，又是關係革命成敗的中心問題。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三七年五月間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問題，曾經這樣提出：『使無產階級跟隨資產階級呢，還是使資產階級跟隨無產階級呢？這個中國革命領導責任的問題，乃是革命成敗的關鍵。』●在一九四九年的

『論人民民主專政』名文中，他又指出：『整個革命歷史證明，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要失敗，有了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勝利了。在帝國主義時代，任何國家的任何別的階級，都不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達到勝利。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曾經多次領導過革命，都失敗了，就是明證。』

同時，在毛澤東同志看來，農民的問題，又是解決無產階級領導的中心問題。

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報告中提出：『誰要是以爲無產階級政黨——假如它在這樣的國度裏面，一般地能夠發生的話——不與農民成立一定的關係，不在事實上援助農民運動，就能够在這些落後的國度裏面實行共產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政策，那就是空想。』

斯大林曾經幾次指出：『民族問題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

毛澤東同志對於中國問題的看法，正是遵循了和發展了列寧斯大林這種看法。

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和一切其他黨派的爭論的主要分歧，便是農民的問題。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的著作上指出：『國民黨反人民集團動員一切力量，向着中國共產黨放出了一切惡毒的箭：明的和暗的，軍事的和政治的，流

●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

● 斯大林：『論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

血的和不流血的。兩黨的爭論，就其社會性質說來，實質上是在農村關係的問題上。」

領導農民革命乃是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根本標誌。資產階級不能成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者，基本上就是因爲它不能領導農民革命、害怕農民革命和反對農民革命。毫無疑問：只有無產階級的領導，才能把極其廣大而又極其散漫的農民有效地組織起來，成爲無窮無盡的戰鬥力量，才談得上工農的聯盟，並才談得上在這個聯盟的基礎上團結一切可能的革命力量到自己方面來，也才談得上中國革命和國際革命力量的團結一致。

大家知道：在第一次革命時期，陳獨秀認爲：「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就是說，他認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級意義和社會基礎」只是資產階級的。農民問題是不在陳獨秀的計算之內的。（參看陳獨秀在一九二三年發表的「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應該指出：從陳獨秀起，所有各種形式的機會主義者，在反對和曲解無產階級領導權這個問題上，都是和農民問題相聯繫的。或者是直接否認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而承認資產階級的領導權，當然也就直接否認了農民革命；這就是第一次革命時期的陳獨秀主義和抗日戰爭初期的右傾機會主義。或者用「左」的形式，在實際上否認聯合中農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必要，從而在實際上否認無產階級的領導權；這就是在十年內戰時期的「左」傾機會主義。

毫無疑問：正是無產階級的領導，以及由此形成的工農聯盟，一方面使反帝反封建

反官僚資本的革命的勝利成爲可能，這也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推翻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派，主要是這兩個階級的力量。』另一方面則使新民主主義革命有成長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這也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主要依靠這兩個階級的聯盟。』●

當然，如果按照機會主義斷送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方向去做，那末，正如過去的一些歷史事實所告訴我們的，就只有使革命失敗，使革命挫折；就沒有中國革命的現在，也沒有中國革命的將來。

五 從農村的革命根據地到全國的革命勝利

大家知道：中國革命是經過了長期艱苦的鬥爭，是經過了不斷地奪取一個陣地又一個陣地，而後取得勝利的。從一九二七年以後，這種陣地的奪取並不是從大城市開始的，而是從農村開始的。從一九二七年以後，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把自己的工作重點移到農村，在農村聚集力量，用農村包圍城市，然後取得城市。這是毛澤東同志堅持的工作路線。事實早已證明：這個路線完全勝利了，因為它是正確的路線，唯一正確的路線。

這個路線是根據於最堅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對中國情況的科學分析。

中國革命的敵人曾經很多並且曾經是很強大的。在一九二七年五月間，斯大林即已說到：『中國革命的敵人太多，太強，內有張作霖、蔣介石、大資產階級、豪紳、地主等等，外有帝國主義者。』

毛澤東同志分析革命敵人的情況，即不但有強大的帝國主義、而且有強大的封建勢力、而且還有勾結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而與人民為敵的大資產階級這樣的情況，因而引出了下面一系列的問題：

『在這樣的敵人面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殘酷性就發生了。因為我們的敵人是異常強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長期間內不能聚積和鍛鍊成爲一個足以最後地戰勝敵人的力量。因為敵人對於中國革命的鎮壓是異常殘酷的，革命力量就非磨練和發揮自己的頑強性，不能堅持自己的陣地和奪取敵人的陣地。因此，那種以爲中國革命力量瞬間就可以組成，中國革命鬥爭頃刻就可以勝利的觀點，是不正確的。』

在這樣的敵人面前，中國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須是武裝的，也就決定了。因為我們的敵人不給中國人民以和平活動的可能，中國人民沒有任何的政治上的自由權利。斯大林說：「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這是完全正確的規定。因此，那種輕視武裝鬥爭，輕視革命戰爭，輕視游擊戰爭，輕視軍隊工作的觀點，是不正確的。

在這樣的敵人面前，革命的根據地問題也就發生了。因為強大的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反動同盟軍，總是長期地佔據着中國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隊伍不願意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妥協，而要堅持地奮鬥下去，如果革命的隊伍要準備積蓄和鍛鍊自己的力量，並避免在力量不夠的時候和強大的敵人作決定勝負的戰鬥，那就必須把落後的農村造成

先進的鞏固的根據地，造成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偉大的革命陣地，藉以反對利用城市進攻農村區域的兇惡敵人，藉以在長期戰鬥中逐步地爭取革命的全部勝利。」^①

用武裝建立革命根據地，這是毛澤東同志把中國革命引到全國勝利的路線的出發點。毛澤東同志指出：必須建立革命根據地，那怕開始只是幾個小塊的，但堅持下去，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必須這樣，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羣衆的信仰，如蘇聯之於全世界。必須這樣，才能給反動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分解。也必須這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爲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②

爲什麼有長期建立根據地這樣的可能性，而可能性又能變成現實性呢？毛澤東同志指出了舊中國下列的各種條件：

「中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微弱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嚴重的半封建經濟同時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業都市和停滯着的廣大農村同時存在，幾百萬產業工人和幾萬萬舊制度統治下的農民和手工業工人同時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軍閥和管理各省的小軍閥同時存在，反動軍隊中有隸屬蔣介石的所謂中央軍和隸屬各省軍閥的所謂雜牌軍這樣

①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②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兩部分軍隊同時存在，若千的鐵路航路汽車路和普遍的獨輪車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還不好走的路同時存在。

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帝國主義的不統一，影響到中國統治集團間的不統一。數國支配的半殖民地國家和一國支配的殖民地是有區別的。

中國是一個大國——「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沒有迴旋的餘地。中國是經過了一次大革命的——準備好了紅軍的種子，準備好了紅軍的領導者即共產黨，又準備好了參加過一次革命的民衆。」

毛澤東同志曾經特別注意指出了由帝國主義在背後操縱的買辦封建統治營壘內部的分裂和戰爭。他指出：「因為有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便給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够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我們只須知道中國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不斷的，則紅色政權的發生、存在並且日益發展，便是無疑的了。』

由上述可知：毛澤東同志把列寧斯大林關於各國資本主義經濟上政治上發展不平衡的規律的理論運用到半殖民地的中國來，經過了對於具體情況的具體分析，得出了關於中國經濟和政治的發展的極大不平衡性、以及由此規定了革命發展的極大不平衡性、革命有利用敵人弱點在農村區域首先勝利的可能性和建立長期的革命根據地的可能性——這一系列完整的結論。顯然，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之後，毛澤東同志這一系列的結論

的意義，對於中國革命說來，是非常重大的。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三六年，做過這樣的回憶：『當着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國游擊戰爭發生不久，湖南江西兩省邊界區域——井岡山的同志們中有些人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這個疑問的時候，我們就把它指出來了（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會議）。因為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不答覆中國革命根據地和中國紅軍能否存在和發展的問題，我們就不能前進一步。』

毛澤東同志領導革命力量向井岡山的進軍，這是對於蔣介石汪精衛的反革命給了極勇敢的攻擊。這個攻擊建立了第一個革命根據地。正是在人民最艱難的時候，這個革命根據地鼓勵了全民族的希望，並跟着而來的，就是許多的革命根據地。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之後，投降主義的陳獨秀派馬上對於革命感到了完全的絕望，變成了取消主義者。他們反對毛澤東同志的路綫和他所領導的向反革命攻擊的勇敢的進軍。他們原來否認農民革命這一點，即有了和托洛茨基派合流的基礎。他們不久就和托洛茨基派相結合，因而被逐出黨外。托洛茨基陳獨秀派極力讚美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力量，無恥到稱頌蔣介石的反革命戰爭為「統一戰爭」，公開宣稱自

●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己『和反動合而爲一』。他們用了最惡毒的話辱罵毛澤東同志和革命。這一小撮墮落爲反革命的卑鄙至極的東西，一直替帝國主義和反革命做了最下賤的工作。

另一方面，我們黨內有些同志則犯了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急性病。他們痛恨國民黨的屠殺政策，並憤怒陳獨秀的投降主義，但是不耐煩做長期艱苦而精細的革命鬥爭，不耐煩長期堅持農村的革命根據地，因而出現了革命速勝論。他們在實際上否認中國經濟和政治的不平衡，否認革命發展的不平衡，夢想革命可以很迅速地在一天早上就完全勝利，或者可以很迅速地在一天早上就取得包括多少城市的勝利。這種『左』傾冒險主義有過三次曾經在黨內取得了暫時的優勢，反對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因而使革命遭受了損失。特別是繼李立三同志所代表的冒險主義之後，以王明（陳紹禹）博古（秦邦憲）兩位同志爲代表的第三次冒險主義給革命的損失最大。但又正是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挽救了由這種冒險主義所造成的危險局面。

革命根據地是經過武裝的鬥爭而建立和保持的。因此，關於革命根據地的問題是和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聯繫在一起的。因此，關於革命根據地的觀點的爭論，實際上就又是關於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爭論。

毛澤東同志在軍事上的偉大貢獻之一，乃是在中國革命長期發展的過程中，把中國革命的游擊戰爭提到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來理解它。毛澤東同志指出：『在這種革命根據地上進行的長期的革命鬥爭，主要的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農民游擊戰爭。因此，

忽視以農村區域作革命根據地的觀點，忽視對農民進行艱苦工作的觀點，忽視游擊戰爭的觀點，都是不正確的。」

「左」傾機會主義者在十年內戰時期內忽視長期堅持農村根據地，也就一定忽視游擊戰爭，忽視積小勝為大勝的道路，不承認游擊戰爭和帶游擊性的運動戰乃是主要的戰爭形式，夢想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條件下進行陣地戰的決戰。這種錯誤的戰略所造成的惡果，就是引到根據地的喪失。而在這樣時候，即在他們的速勝論沒有達到目的反而喪失許多根據地之後，他們就轉陷於悲觀的情緒裏面去，轉到右傾方面去。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們對於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也是速勝論的觀點。他們對於堅持和大量猛烈地發展抗日的農村根據地及抗日的游擊戰爭這個方針，也沒有感到興趣；對於人民武裝的作戰方針，也是不顧戰爭初期敵我力量懸殊的條件，而只注重要「正規戰」；這些都是和他們在十年內戰時期的主張相類似的。不同的，就是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們完全表現出他們喪失了對於人民力量的信心，他們把抗日戰爭勝利的希望，主要地寄托於國民黨軍隊的「正規戰爭」，而看不見人民武裝的偉大的地位及其偉大的前途。

毛澤東同志關於游擊戰爭的作戰方法，是在一定條件下，「化整為零」，「分兵以發動羣衆」；在另一條件下，「化零為整」，「集中以應付敵人」。毛澤東同志關於革

命戰爭的主要戰略，是盡可能地、大量地發展游擊戰爭，在一定條件下，經過力量的成長，把游擊戰爭轉變為正規戰爭。例如在十年內戰後期。在這時期，這種正規戰爭還是帶游擊性的運動戰。在另一條件下，根據敵情的變化，又把正規戰爭轉變為游擊戰爭。例如在抗日戰爭初期。在這時期，主要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又由於新的條件，由於革命力量的新成長和敵情的新變化，游擊戰爭又轉變為正規戰爭。例如在抗日戰爭最後階段以及在抗美援朝的解放戰爭時期。在解放戰爭後期，正規戰爭已經發展到運用大量重武器並包括攻堅戰的大兵團作戰了。這一切戰略上的變化，同時就伴隨了革命根據地的變化，即由小塊的根據地到大塊根據地的變化，到包括一些城市在根據地內的變化，到在半個中國勝利的變化，到在全國勝利的變化。

當革命在全國範圍內勝利之後，毛澤東同志即提出必須建立完全近代化的軍隊，用以保衛我們的祖國。一九四九年九月間，毛澤東同志在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開幕詞指出：「我們的國防將獲得鞏固，不允許任何帝國主義者再來侵略我們的國土。在英勇的經過了考驗的人民解放軍的基礎上，我們的人民武裝力量必須保存和發展起來。我們將不但有一個強大的陸軍，而且有一個強大的空軍和一個強大的海軍。」美帝國主義對於我國領土台灣的掠奪和對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侵略，完全證明了毛澤東同志在兩年前所指示的建立現代化國防力量的必要。中國人民在組成志願軍與朝鮮人民軍勝利地並肩反抗美國侵略的同時，正在努力建立完全現代化的陸軍、強大的空軍和海軍。

毛澤東同志在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上，極其生動地、極其光輝地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法，並步步地和勝利地證明了這辯證法。但機會主義者或教條主義者總不顧敵我力量的對比如何，只是片面地強調一個『正規戰爭』，在生活中閹割了辯證法，因此，生活給他們碰到的，就盡都是苦頭。

六 又聯合又鬥爭的廣泛統一戰綫

中國本來是一個農業國，近代曾經是處在各帝國主義侵略下的極端動盪的半殖民地，如前面所說，這是在東方成爲許多矛盾焦點的國度。這樣，就使得中國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有可能充分利用各種矛盾，集中一切可能的力量，各個擊敗人民的敵人。

對於這個問題，在中國黨的歷史上發生過兩種錯誤的東西。一種是右傾機會主義：例如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革命時期的陳獨秀主義，以及抗日戰爭初期有的同志所犯的右傾錯誤，他們主張無原則的統一戰綫，企圖使無產階級變成資產階級的尾巴。毛澤東同志把這種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叫做『一切聯合，否認鬥爭』。又一種是『左』傾機會主義：例如在十年內戰時期中三次發生的，否認任何統一戰綫，企圖使無產階級和雇農貧農處於孤立的地位。毛澤東同志把這種『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叫做『一切鬥爭，否認聯合』。

顯然，否認中國革命有廣泛的統一戰綫的可能性和在一定條件下的必要性，這乃是

很錯誤的。一九二七年八月間，斯大林就中國問題駁斥托洛茨基派的時候，指出列寧主義在解決殖民地和附屬國革命問題時的基本出發點，就是必須嚴格區別帝國主義國家裏的革命和受別國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裏的革命。在前一類國家裏的資產階級和後一類國家裏的民族資產階級是有差別的，這種差別就是前一類的資產階級是別國人民的壓迫者，『在革命的一切階段上都是反革命的』，而後一類的民族資產階級則『在某一階段上和某一時期內可以支持本國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

這也就是說：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在一定歷史條件中，有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革命統一戰綫的可能性。

當然，在這種統一戰綫中，必須不致模糊無產階級自己的獨立面目，必須絕對保持無產階級運動的獨立性。無產階級必須在統一戰綫中樹立自己的領導地位。這種原則也是列寧斯大林所已規定了的。

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革命的經驗，特別是根據共產黨和國民黨進行過統一戰綫的經驗，發展了列寧斯大林這些觀點，並形成了一套關於中國革命統一戰綫的完整的正確的政策。

毛澤東同志把中國共產黨同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綫的政策，特別是如在抗日戰爭時期

● 斯大林：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聯席會議上的演說。

中對於國民黨大資產階級的政策，叫做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其所以需要又聯合又鬥爭，原因就是中國資產階級的「二重性」。「左」傾關門主義看不見中國資產階級的「二重性」，從而否認聯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右傾機會主義也看不見中國資產階級的「二重性」，從而否認鬥爭的必要性。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政策，就是對於右的和「左」的機會主義進行堅決的嚴肅的兩條戰綫的鬥爭。

這兩種機會主義在各個時候的危險性是不一樣的。中國的革命史證明：當着對於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綫還沒有成爲事實的時候，「左」傾關門主義乃是黨的主要危險；但當着統一戰綫變成事實的時候，右傾投降主義就時常成爲黨的主要危險了。例如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時期，「左」傾機會主義甚至否認了和一般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綫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把小資產階級的一些小黨派以及民族資產階級的一些在野派都認爲是革命最危險的敵人。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東北的事變曾引起了中國內部階級間政治關係的新變化，但「左」傾機會主義者的看法依然沒有什麼變化。這個「左」傾錯誤在這樣的時候乃是主要的危險，因爲它阻礙了黨和廣大人民間的聯繫，並阻礙了黨充分利用各種矛盾以利於革命的可能性。可是，到了一九三七年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成爲事實之後，一些犯「左」傾錯誤的同志，以陳紹禹同志爲代表，就轉而犯了右傾的錯誤。這個右傾錯誤在這樣的時候乃是主要的危險，因爲它阻礙了黨和統一戰綫中的反動力量及反動傾向的鬥爭，有使無產階級喪失獨立的危險。

在抗日戰爭期間，統一戰綫甚至包括到以蔣介石爲代表的國民黨當權派，他們是和共產黨進行過十年殘酷戰爭的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其所以有包括他們的必要，是因爲他們當時擁有龐大的軍隊，而美帝國主義則和日本帝國主義有爭奪遠東霸權的矛盾。在形成這樣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綫之後，毛澤東同志根據階級的分析，指出了這種統一戰綫內部存在了左中右三個不同的集團，而提出了擴大與鞏固左翼集團、爭取中間集團的進步與轉變、孤立右翼集團的政策，也即是『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政策。但犯右傾錯誤的同志却起來反對毛澤東同志的政策，抹殺了統一戰綫中有階級的區別，提出了『不分左中右』來和毛澤東同志的政策相對立，否認中國有法西斯的存在，甚至抹殺了國共兩黨的階級區別，而把國共兩黨都認爲是『中國一大部分優秀進步青年的總匯』（見陳紹禹同志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發表的『挽救時局的關鍵』）。右傾的意見在實際上是保護了蔣介石國民黨的頑固勢力。

犯右傾錯誤的同志否認了毛澤東同志在抗日戰爭期間所提出的『統一戰綫中的獨立自主』的原則，而在實際上主張一切經過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犯右傾錯誤的同志並在軍事上主張『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在實際上，這乃是要使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合併於國民黨軍隊，任令蔣介石去併吞，完全適合於蔣介石後來所謂『軍令政令之統一』的反革命要求。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他們『……對於國民黨的反人民政策讓步，信任國民黨超過信任羣衆，不敢

放手發動羣衆鬥爭，不敢在日本佔領地區擴大解放區和擴大人民的軍隊，將抗日戰爭的領導權送給國民黨」。

毛澤東同志在說明「統一戰綫中的獨立自主」這個原則時，曾經指出：「我們這樣做的目的何在呢？一方面是在保持自己已經取得的陣地。這是我們的戰略出發地，喪失了這個陣地就一切無從說起了。但是主要的目的還在另一方面，這就是爲了發展陣地，爲了實現「動員千百萬羣衆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個積極的目的。」毛澤東同志在政治上和戰爭的戰略問題上所提出的原則及由此所規定的一系列的政策，是爲了引到一個總的大目標，即引到抗日戰爭的結局成爲人民勝利的結局。而這些原則和政策的問題對於是否能夠達到這樣的結局，則是帶決定性的問題。

但是，右傾的觀點及其政策，首先就是放棄了自己已經取得的陣地，因此，發展陣地也無從說起了。因此，犯右傾錯誤的同志就不可避免地引到一個完全和毛澤東同志相反的結論。例如，當時陳紹禹同志在「挽救時局的關鍵」的文章中曾經對於抗日的前途作過這樣的估計：「中國現在的實際情形是：如果國共兩黨以合作的力量和方式達到驅逐日寇出境的勝利，那麼，國民黨在實際上證明其爲中國人民的民族生存而奮鬥的最大政

●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 「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

黨，國民黨的領袖蔣先生及其他堅決領導抗戰的人物，將成爲中國的不朽的民族英雄，那時候，誰能違反中國人民的意志而進行推翻國民黨的鬥爭呢？」『由此可見，聽信「抗日勝利了是共產黨蘇維埃的天下」這種謠言的人，不但是對於中國的實際情形太隔膜，而且是對於中國國民黨的戰鬥力量和光明前途無信心。這顯然是非常有害的事情。』這種意見就是說，抗日勝利了之後依然只能是最反動的蔣介石國民黨的天下，而不能夠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的天下。這種結論正是右傾分子當時一連串的右傾觀點及其錯誤政策在邏輯上所不可避免地引出的結論。這種結論恰恰是對於中國人民的戰鬥力量和光明前途的非常有害的和可恥的結論，而中國人民的戰鬥生活早已推翻了這種可恥的結論。恰恰和陳紹禹同志所作的估計相反：蔣介石只成了『國人皆曰可殺』的賣國賊，而永遠照耀中國人民前進的真正不朽的民族英雄，乃是無數可歌可泣的共產黨員和人民的戰士們。由此可見，對於中國實際情形太隔膜的，完全不懂中國的實際情形的，不是別人，正是右傾分子自己。

犯右傾錯誤的同志要以片面的消極的讓步去希望保持和蔣介石國民黨的團結。然而這是完全錯誤的。毛澤東同志和右傾的同志相反，是以積極的鬥爭的政策爲達到團結一切抗日勢力的手段。毛澤東同志說：

『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中，鬥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鬥爭的目的。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

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所發生的國內事變，完全證明了毛澤東同志所說的這個真理。我們黨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政策，在統一戰綫中堅決地以又聯合又鬥爭的革命兩面政策，去對付國民黨大資產階級的又抗日又準備投降、又聯共又反共的兩面政策，結果就放手地發動了人民大眾，團結了一切可能的抗日力量，穩定了動搖者，孤立了頑固派，打退了蔣介石的幾次反共高潮，因此也就堅持了抗日戰爭，維持了抗日的統一戰綫，直至最後。

右傾分子完全不了解：我們在抗日時期中蔣介石國民黨的統一戰綫，乃是建立在人民的武裝力量的基礎之上。蔣介石是被迫來這樣做的。如果沒有人民的武裝力量，蔣介石決不會和我們建立什麼統一戰綫。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右傾分子完全不了解：蔣介石國民黨在被迫和我們建立統一戰綫之後，依靠他的反革命武裝，隨時隨地都企圖利用一切方法和一切機會來進攻我們，隨時隨地都企圖消滅共產黨和人民的武裝力量。因此，我們也就只得依靠人民的武裝力量，去和蔣介石國民黨這種反革命的進攻作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毛澤東同志批判了右傾分子在這兩個基本方面的錯誤，指出了這個抗日的聯合，主要的是武裝力量的聯合，但抗日統一戰綫中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當蔣介石配合日本侵略者向人民的武裝力量和抗日根據地進行武裝進攻的時候，我們就不能任令蔣介石放肆下去，而必須進行正義的、必要的、有理有利有節的武裝自衛的鬥爭，而在

事實上，當蔣介石配合日本侵略者舉行三次武裝進攻的反共高潮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並沒有被這種反革命的進攻所屈服，而是相反，把它堅決地打退了，這就保衛了人民的武裝力量和抗日根據地，爭取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在抗日統一戰綫中，關於和國民黨頑固派鬥爭問題，除了右傾的觀點認為「鬥爭會破裂統一戰綫」以外，還有一種「左」傾的觀點，認為鬥爭可以無限制地使用，或者對於中間勢力採取不正確的策略。毛澤東同志不但批評了右傾的觀點，同時也批評了「左」傾的觀點。正是因為要防備當時可能發生的過「左」的錯誤，毛澤東同志在和國民黨頑固派的鬥爭中提出了有名的三原則，即「有理」的條件，「有利」的條件，「有節」（鬥爭適可而止）的條件。毛澤東同志指出：「堅持這種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就能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派，並使頑固派爾後不敢輕易向我們進攻，不敢輕易同敵人妥協，不敢輕易舉行大內戰。」

這種在民族統一戰綫中對資產階級頑固派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正是實現了毛澤東同志所曾經說明過的「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一致性」。這是毛澤東同志運用得非
常成功的革命藝術，也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藝術。在抗日戰爭當中，由於毛澤東

● 「目前抗日統一戰綫中的策略問題」。

● 「統一戰綫中的獨立自主問題」。

同志這種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極大限度地孤立了頑固勢力，爭取了中間勢力，發展了進步勢力，並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和軍事上使共產黨和人民都有了充分的準備，因而在日本投降後，中國共產黨能夠領導人民穩步地、毫不慌亂地在兩三年的時間內，粉碎了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所發動的反對中國人民的反革命戰爭，推翻了中國這個以蔣介石為代表的最後的反革命王朝，成就了百年來中國人民所追求的勝利。

在抗日戰爭期間，民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在工人農民及其他小資產階級和蔣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之間，形成為中間勢力。中國共產黨對於他們採取了爭取的政策。當時毛澤東同志說明了這樣的情況：

『他們雖然同工人有階級矛盾，不贊成工人階級的獨立性；但他們在淪陷區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在國民黨統治下則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限制，因此他們還要抗日，並要爭取自己的政治權力。在抗日問題上，他們贊成團結抗戰；在爭取政治權力問題上，他們贊成憲政運動，並企圖利用進步派和頑固派之間的矛盾以達其目的。這一階層，我們是必須爭取的。』

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可能性，是聯合的政策；對於它的動搖性和妥協性，是批評的政策，也即是另一種鬥爭形式的批評政策。這是和對於國民黨頑固派的鬥爭形式有

區別的批評的政策，因為民族資產階級不是當權派。但這也是一種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這個政策是要堅定民族資產階級對於反帝國主義鬥爭的態度。

在抗日戰爭結束之後，民族資產階級繼續受蔣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的限制和壓迫，同時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被趕走之後又來了美帝國主義的壓迫，這個美帝國主義的壓迫也損害了民族資產階級。這樣，就存在了無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繼續統一戰綫的可能性。問題依然是：對於它的革命可能性，是聯合的政策；對於它的動搖性和妥協性，是批評的和鬥爭的政策。

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毛澤東同志還指出了革命勝利後，在經濟上和民族資產階級進行統一戰綫的必要性。

當然，如毛澤東同志所說明的：在經濟上的統一戰綫，也必須有又聯合又鬥爭兩方面的政策。我們對於資產階級的發展工業生產的積極性，是聯合的政策；而對於資產階級的投機操縱和破壞政府法令與經濟計劃的行爲，則又是鬥爭的政策。

幾年來的事實，繼續證明了毛澤東同志關於「爲了對付帝國主義的壓迫，爲了使落後的經濟地位提高一步，中國必須利用一切於國計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鄉資本主義因素，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奪鬥」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從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經濟上的種種事實，可以看出這種正確；而且從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和土地改革這些規模宏大的人民運動，更可看出這種正確。

幾年來的事實，繼續證明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因為它企圖在統一戰綫中犧牲無產階級獨立自主和領導的地位，因而不可避免地要犧牲人民的勝利。同樣地也繼續證明了「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因為它在必需和可能最大限度地孤立革命的敵人的時候，轉而企圖孤立自己，因而有利於敵人。

七 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問題

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的著作中寫道：

「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個共產黨員入黨的時候，心目中就懸着爲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鬥和爲將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鬥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而不顧那些共產主義敵人的無知的和卑劣的敵視、污蔑、謾罵或譏笑；對於這些，我們必須給以堅決的排擊。對於那些善意的懷疑者，則不是給以排擊而是給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釋。所有這些，都是異常清楚、異常確定和毫不含糊的。」

這一段話完全清楚地說明了中國的將來。這是世界歷史的規律同樣地是中國歷史的規律所決定的，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右傾機會主義者看不見這個將來，或者是對於這個將來看得非常渺茫或非常暗淡。

他們既然認爲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者應是資產階級，因此，他們就認爲革命的果實只應落在資產階級的身上。例如，陳獨秀在一九二三年發表的『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一文寫道：『此種民主革命的成功誠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這是從右方面直接否認了社會主義的前途。『左』傾機會主義者相反，抹殺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區別，或者認爲革命在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就是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開始；或者是認爲革命勝利推廣到中國『重要部分』的時候，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就成爲基本任務，認爲只有在實行社會主義的基礎上，才能推翻國民黨反動派和帝國主義的統治。這種『左』傾急性病從『左』方面直接否認了民主革命勝利的可能性，從而在實質上否認有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性。

也正如其他的許多問題一樣，『左』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在這個問題上也是能够相互過渡的。如前面所述，當抗日戰爭初期，即當着我們黨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力求在一切工作步驟上準備使抗日戰爭的結果成爲人民勝利的結果的時候，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犯過『左』傾錯誤的同志，這時就作了另一個完全相反的斷定，認爲抗日勝利的『前途』是屬於蔣介石國民黨的，並不是屬於人民的。這一個斷定，很清楚地乃是一並否認了民主革命勝利的前途與社會主義的前途。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後不斷地駁斥了那些在革命性質問題上的錯誤的『左』傾思潮。他認爲必須徹底地完成中國的民主革命。『要這樣才能培養出中國革命的社會

主義前途。若果否認這個民權革命的階段，認為中國革命已經到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機，這種誤解於中國革命極有害。」毛澤東同志認為當時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性質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的意見是完全正確的：「我們經過的鬥爭中，證明國際意見的真實。」^①

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的具體條件，發展了列寧斯大林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學說。他說：「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不是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者。我們主張經過民主共和國的一切必要的階段，到達於社會主義。我們反對尾巴主義，但又反對冒險主義和急性病。」^②

毛澤東同志又說：「每個共產黨員須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整個中國革命運動，是包括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在內的全部革命運動；這是兩個性質不同的革命過程，只有完成了前一個革命過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後一個革命過程。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而一切共產主義者的最後目的，則是在於力爭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後的完成。只有認清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同時又認清二者的聯繫，才能正確地領導中國革命。」^③

①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毛澤東同志起草的『紅軍第四軍六次代表大會決議案』。

② 『為爭取千百萬羣衆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而鬥爭』。

③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因此，從全部革命運動的發展看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是爲了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一個過渡的階段』^①。

爲什麼會有這種轉變和過渡的可能呢？從階級來說，這就是由於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從黨來說，這就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毛澤東同志完全正確地指出：『領導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這樣兩個偉大的革命到達澈底的完成，除了中國共產黨之外，是沒有任何一個別的政黨（不論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或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能够擔負的。而中國共產黨則從自己建黨的一天起，就把這樣的兩重任務放在自己的雙肩之上了。』^②

如上所述，混淆民主革命的階段與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乃是完全錯誤的。但另一方面，這絕不是說，在民主革命階段中不能够包括有社會主義因素的東西。如果這樣想，當然也是完全錯誤的。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三九年論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結果時寫道：

『資本主義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這是經濟落後的中國在民主革命勝利之後不可避免的結果。但這只是中國革命的一方面的結果，不是它的全部結果。中國革命的全

①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② 同上。

部結果是：一方面有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又一方面有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

毛澤東同志在當時正是根據無產階級的領導權這一個根本點來作這樣的論斷的。我們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的政治和經濟，業已完全證明了毛澤東同志這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論斷。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結果，在政治上有關於社會主義因素方面的，主要的是什麼呢？這就是工人階級在國家政權機關中的領導地位，在人民軍隊中的領導地位。這是在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所已經規定了的。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結果，在經濟上有關於社會主義因素方面的，主要的是什麼呢？這就是沒收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的企業歸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所有，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這「就使人民共和國握有國家的經濟命脈，成爲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這一部分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不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共同綱領也把這點明白規定了。在共同綱領上是這樣寫的：

「國營經濟爲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凡屬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民生計的事業，均應由國家統一經營。凡屬國有的資源和企業，均爲全體人民的公共財產，爲人民共和國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主要物質基礎和整個社會經濟的領導力量。」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所發展起來的農民勞動羣衆的互助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及供銷合作社，也帶有社會主義的因素，是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的形式。

不錯，我們要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社會主義改造，還是需要相當的時間的。但是我們這個前提已經有了。我們這個道路已經打開了。這還需要種種準備和鬥爭的過程，但是我們的前進是完全可靠的。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

「我們的國家就是這樣的穩步前進，經過戰爭，經過新民主主義的改革，而在將來，在國家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大爲興盛以後，在各種條件具備了以後，在全國人民考慮成熟並在大家同意了以後，就可以從容地和妥善地走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

右傾機會主義企圖把共產主義這一種偉大的理想只作爲博物館裏面的裝飾品，「左」傾機會主義則企圖剝奪共產主義這一種偉大的理想的豐富的生動的血肉。毛澤東同志則照顧中國歷史一切必經的道路，把共產主義的原則嚴肅性和到達於共產主義目標的政策靈活性結合起來，因此，共產主義在中國就不會是空想的，不會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而是完全能夠到達的，完全不能抵抗的，完全富有生命的。

八 黨的建設問題

毛澤東同志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的過程，也就是中國共產黨日益布爾塞維克化的過程。

怎樣使黨的一切正確路綫能夠貫徹執行下去，能夠變成羣衆的路綫呢？怎樣使黨所指出的和所奮鬥的各種可能性能夠變成現實性呢？集中的問題便是關於黨本身的問題。

毛澤東同志經常說到：如果沒有一個列寧斯大林式的布爾塞維克化的黨，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毛澤東同志說：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列寧、斯大林式的革命黨。沒有這樣一個革命黨，沒有一個按照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黨，就不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羣衆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自從馬克思主義產生以來的一百多年的時間內，只是在有了俄國布爾塞維克領導十月革命、領導社會主義建設和戰勝法西斯侵略的榜樣的時候，才在世界範圍內建立了和發展了新式的革命黨。自從有了這樣的革命黨，世界革命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這個變化是如此鉅大，以致使老一輩的

人們完全不能設想的變革，都轟轟烈烈地出現了。中國共產黨就是依照蘇聯共產黨的榜樣建立起來和發展起來的一個黨。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煥然一新了。」

如果沒有堅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就不可能有這樣的革命黨。列寧的名言：「只有受先進理論指導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斯大林在「聯共黨（布）歷史」的結束語上說：「只有精通了馬列主義理論的黨，才能確有把握地向前進展，才能引導工人階級前進。」毛澤東同志完全認為：我們的黨要真正能夠完全勝任擔負一系列的偉大歷史任務，要真正能夠把中國人民從一個勝利引到又一個勝利，首先就必須在黨內思想上形成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統一，提高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鞏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領導。毛澤東同志說：「我們要領導人民打倒敵人，我們的隊伍就要整齊，我們的步調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在毛澤東同志看來，什麼是我們隊伍整齊、步調一致的基礎呢？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統一。怎樣能夠使我們成爲精兵呢？怎樣能夠使我們的武器變成好武器呢？這就是提高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毛澤東同志說：

● 「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

● 「整頓黨的作風」。

「只要我們能够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信任羣衆，緊緊地和羣衆一道，並領導他們前進，我們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礙與戰勝任何困難的，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¹⁰

這樣，毛澤東同志就不能不用很大的力量，去和各式各樣的錯誤思潮作鬥爭，從思想上來建設我們的黨，來鞏固我們的黨。

毛澤東同志極其明確地把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和黨性聯繫起來，認為這二者是一致的東西。他指出：

「沒有科學的態度，即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統一的态度，就叫做沒有黨性，或叫做黨性不完全。」¹¹

毛澤東同志極其概括地指出了黨內發生過而爲黨所必須大力反對的兩種主觀主義的思潮：即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毛澤東同志說：「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兩者都是主觀主義，是從不同的兩極發生的東西。」它們從不同的兩極出發，達到一個最基本的共同點，就是片面性。「他們都是只看到片面，沒有看到全面。」¹²在這種片面性的共同點的基礎上，就使彼此能够在一定時間內和一定的實際問題上互相聯繫起來，獲得一致的

①「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②「改造我們的學習」。

③「整頓黨的作風」。

觀點。

這兩種主觀主義的思潮乃是黨內一切犯過右傾機會主義或「左」傾機會主義在思想上的基礎，是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在認識論上的完全分歧，因此，是我們黨內正確的思想和不正確的思想之間的鬥爭問題中的最本質的問題；因此，毛澤東同志認為要和各種機會主義做有效的鬥爭，就必須在這最本質的思想問題上擊敗機會主義。

小資產階級乃是這兩種主觀主義的社會基礎。這種錯誤的反動的思潮對於我們其所以是嚴重的，就是因為我們有很大數量的黨員是出身自小資產階級的。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成份極其廣大的國家，我們黨是處在這個廣大階級的包圍中，我們又有很大數量的黨員是出身於這個階級的，他們都不免或長或短地拖着一條小資產階級的尾巴進黨來。」^①因此，毛澤東同志很久以來即不放鬆對主觀主義思潮的鬥爭。在一九二九年毛澤東同志即已具體的提出：第一，必須「教育黨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觀主義的分析和估量」。第二，必須「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鬥爭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們知道離開了實際情況的調查，就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②。在一九三七年，毛澤東同志更綜合了長期的經驗，針對這兩種主觀主義，寫出了他的傑出的哲學著

① 「反對黨八股」。

② 「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作『實踐論』和『矛盾論』。毛澤東同志後來所發動的在我們黨史上有極大歷史意義的整風運動，正是從這些思想引出的。

毛澤東同志對於黨的問題所給的很突出的貢獻之一，便是指出了這兩種從不同的兩極表現出來而又可以合流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並由此指出了克服這兩種主觀主義的正確方向。毛澤東同志說：

『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必須使上述兩種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發展，必須使兩種人互相結合。有書本知識的人向實際方面發展，然後才可以不停止在書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後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成爲理論，然後才可以不把局部經驗誤認爲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

循着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這樣方向前進，就是到達於理論與實踐的統一。

斯大林以下的名言，時常被毛澤東同志用以說明自己的思想：『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繫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同樣，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爲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教條主義的錯誤，恰是前一種。經驗主義的錯誤，恰是後一種。而要克服前一種錯誤，又克服後一種錯誤，這就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

把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和不斷地研究羣衆的經驗結合起來，這就是毛澤東同志的領導。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結合」。

根據我們黨的領導工作的經驗，毛澤東同志指出：

「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這就是說，將羣衆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爲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羣衆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爲羣衆的意見，使羣衆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羣衆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羣衆中集中起來，再到羣衆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怎樣能夠不斷地把羣衆的意見和羣衆的經驗集中起來而又到羣衆中去呢？這就是依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般指導原理。經驗主義者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般指導原理，因此，只能停留在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的狀態中；教條主義者拋棄羣衆的意見和羣衆的新經驗，因此就談不上研究，談不上把羣衆的意見化爲集中的系統意見；這些就注定了他們的領導的錯誤，以及他們所領導的工作的失敗。

我們三十年來的黨史，就是這種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領導和那種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領導兩方面鬥爭的歷史，又正是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戰勝錯誤領導、從而克服革命的挫折和困難，終於把革命引到偉大勝利的歷史。

這種正確領導在思想上反對主觀主義，在政治上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是和那在組織上反對宗派主義的鬥爭相聯繫的。

小資產階級的狹隘性除了表現其在思想上的片面性外，又表現其在政治生活上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在思想上脫離黨內外的羣衆，而宗派主義則在政治生活上和組織上脫離黨內外的羣衆。二者是互爲表裏的。這種宗派主義曾經在一個長時期中造成了很大的惡果。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九年嚴厲地攻擊過小團體主義，指出了它「具有很大的銷蝕作用和離心作用」。所謂「小團體主義」也即宗派主義。在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同志說道：

「由於二十年的鍛鍊，現在我們黨內並沒有佔統治地位的宗派主義了。但是宗派主義的殘餘是還存在的，有對黨內的宗派主義殘餘，也有對黨外的宗派主義殘餘。對內的宗派主義傾向產生排內性，妨礙黨內的統一和團結；對外的宗派主義傾向產生排外性，妨礙黨團結全國人民的事業。剷除這兩方面的禍根，才能使黨在團結全黨同志和團結全國人民的偉大事業中暢行無阻。」

舉起這個反宗派主義的旗幟，團結了全黨，又發展了黨和羣衆的正確關係，便是毛澤東同志對於黨的問題所給的很突出的又一個貢獻。顯然，只有在思想上政治上正確了，又在黨內關係和羣衆關係上都正確了，那麼，我們的勝利便是不可抵抗的。

怎樣能够大量地和最有效地克服我們黨內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呢？我們的歷史條件既然使我們黨內所存在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是很大量的，那麼，要克服他們的種種錯誤，鞏固黨的統一，就必須是採取既嚴肅而又謹慎的態度，而不能是自由主義的或粗率的態度。

毛澤東同志對於黨的問題所給的很突出的第三個貢獻，就是提出了一種適合於我們黨內鬥爭的運動形式，即整風運動的形式，學習運動的形式。這種運動的形式，就是在黨的統一領導下，把我們黨內歷史的問題，把我們黨內錯誤的問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有關的文獻和黨的文件，提交給黨的幹部和黨員羣衆，在黨的幹部和黨員羣衆中組織充分的學習和討論，採取自我批評和批評的方式，把黨的幹部和黨員羣衆引到思想自覺和政治自覺的道路，使他們在黨的幫助下自覺地『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種運動的宗旨，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出，就是：

「第一是「懲前毖後」，第二是「治病救人」。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

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過去的壞東西，以便使後來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這就是「懲前毖後」的意思。但是我們揭發錯誤、批判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爲了救人，而不是爲了把人整死。一個人發了闌尾炎，醫生把闌尾割了，這個人就救出來了。任何犯錯誤的人，只要他不諱疾忌醫，不固執錯誤，以至於達到不可救藥的地步，而是老老實實，真正願意醫治，願意改正，我們就要歡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變爲一個好同志。」

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所曾經反覆說過的「藉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這就是說，對待黨內錯誤的思想，既要嚴肅，反對採取自由主義的態度，又要謹慎，反對採取粗暴的態度。這樣做是對於我們黨很有益的，並且是很成功的，這些已由我們黨在一九四二年發動整風運動以來的一切歷史所證明了。

人們都能够看出：整風運動極大規模地而又極深刻地改變了我們黨的面貌：其一是我們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水平因此很大地提高了，其二是我們黨在中央委員會和毛澤東同志的周圍達到了從來所沒有的大團結。這兩方面，保證了並保證着毛澤東同志的政治路線能够在各方面貫徹下去，而使我们能够打败一個敵人又一個敵人。

一九四五年四月間，黨舉行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是團結全黨的大會，是總結

黨在抗日戰爭中貫徹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政策所達到的成果和準備全國人民勝利的大會。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大會上的政治報告提出了團結全黨和團結全國人民的方針和綱領，以便爭取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六年來的歷史事變，證明了大會所決定的政治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全國大革命的勝利完全實現了。這個大會是在全黨整風運動的基礎上舉行的，而全黨幹部又正是因為經過了整風運動，所以能夠勝利地執行大會所給予的歷史任務。

整風運動所犧牲掉的東西，就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以及這二者的表現形式——黨八股。但所得到的，便是我們黨在思想上準備了、並在政治上領導了一個反帝國主義的偉大人民革命的勝利。

這就是說，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我們的黨已經是能夠勝任擔負一切歷史任務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黨。

這就是說，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追隨蘇聯共產黨的榜樣，我們的黨已經是布爾塞維克化的革命黨。

我們繼續前進和將來事業能夠勝利的可靠性，主要地也就在這裏。

九 結束語

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一個近五萬萬人口大國中的勝利。這個革命是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又一次偉大的革命，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在被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內所舉行的另一種典型的大革命。

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在思想上和理論上集中地表現出中國這一個典型的革命，集中地表現出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這個革命中的極其生動的力量。

列寧曾經寫道：

『我們並不把馬克思底理論視爲一成不變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恰巧相反，我們深信，它只是爲一個科學奠定了基礎，而社會主義者若不願落後於實際生活，就應當在各方面把這個科學向前推進。我們認爲俄國社會主義者特別必須獨立闡發馬克思底理論，因爲它僅僅提供出一般的指導的原理，而這些原理的應用，局部說來，在英國是與法國不同，在法國是與德國不同，在德國是與俄國不同的。』

『聯共黨（布）歷史』的結束語指出：

『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強有力的地方，就在於它使黨能判明局勢，能瞭解周圍事變的內在聯繫，能預察事變的進程，不僅察知事變在目前怎樣和向何處發展，而且能察知事變在將來會怎樣發展和向何處發展。』

這個『結束語』又指出：

『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這就是說要善於拿革命運動底新經驗來豐富它，要善於拿新原理和新結論來豐富它，要善於發展它和推進它，不怕根據這個理論底實質去用適合於新歷史環境的新原理和新結論代替其某些已經過時的原理和結論。』

毛澤東同志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精神，正是列寧斯大林這樣的精神。

顯然，毛澤東同志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般指導原理到東方的國家中來，這種東方國家與歐洲的資本主義國家有更大的不同，所以就需有很大的理論上的勇敢和創造性。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同志曾經被人反對；但毛澤東思想也因此取得了勝利。

關於在農村中舉行長期革命戰爭，用農村包圍城市然後取得城市的結論，關於由建設和堅持許多小塊根據地的革命政權而在長期的鬥爭中逐步發展，逐步擴大，到奪取全國政權的結論，都是毛澤東同志在二十幾年前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研究中國革命問題所獲得的明確的結論。這是馬克思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的新結論。這個新結論是正確的，因為它是被中國革命所證明了，因為它也正在被東南亞其他國家的生活所證

明着。這是說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的不可抵抗，辯證法的不可抵抗。

劉少奇同志在一九四九年的亞洲澳洲工會代表會議『開幕詞』上說：

『中國人民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道路，是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所應該走的道路。』

『這條道路就是毛澤東的道路。』

毛澤東思想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東方的發展。這個東方革命的集中的經驗，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有重大的意義的。就世界的鬥爭全局來說，這個意義是具普遍性的意義。